

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

——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2)

提 要: 本文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出发,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中关于收入分配与发展阶段关系的成果,评述了相关的发展模式及其得失,探讨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条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再分配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的降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本文特别揭示和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特征,强调了劳动力更加充分流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中等收入陷阱;收入不平等;刘易斯转折点;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6-0001-06

一、引 言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报告《东亚的复兴》中,一方面为以中国为主要引擎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特别指出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Gill and Kharas, 2007)。这种观察恰好与很多学者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相互印证:一个国家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后,并且在达到 3000 美元之前的整个期间,通常处于一个社会问题敏感区。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尽管经济增长可能很快,但社会问题也会大量产生,进而积累起社会矛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形成社会危机,从而中断正在进行的经济增长。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2042 美元,处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 826 美元 ~ 3255 美元的低中等收入组。

为了考察一个国家处在人均 GDP 在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时期,与处在其他收入区间有什么不同的条件,可能产生哪些不同的社会问题,我们选取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考察是否存在以及为什么存在这种现象。在图 1 中,横坐标用来表示 1970 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纵坐标表示 2003 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看一看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期间的发展过程,从而 30 年后的发展结果有什么关系。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000 美元以下起步的国家,30 年的增长效果不佳,同时国家之间的分化也不大。而从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区间起步的国家,30 年后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经济增长绩效迥然不同。从统计上看,1970 年人均 1000 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其在 1970 年所处的发展水平与 2003 年所处的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1970 年人均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其在 1970 年所处的发展水平与 2003 年所处的发展水平之间,相关关系较弱;从 1970 年人均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起步的国家和地区,到 2003 年时,相互之间的差异显著增大(图中阴影部分),分化的幅度超过 1970 年从 1000 美元以下起步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均收入在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之间,的确导致国家或地区进入一个发展的分化期和社会敏感区间。用世界银行的说法,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具体来解说图 1 描述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分化现象。一方面,当人均收入低于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增长的主要制约是资本积累水平低从而投资不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也很低。在这个期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比较传统的。即在这个阶段,核心是如何通过积累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如果能够克服某些要素瓶颈,即使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也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之后,不同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就会体现出来。如果所实施的发展战略不能形成充分就业格局,不能使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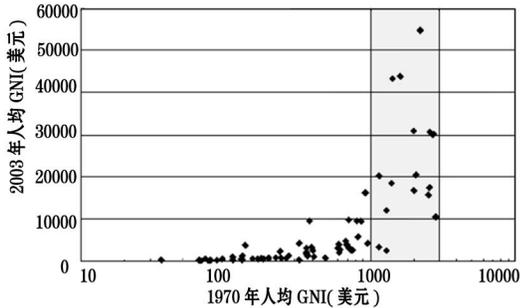


图1 各国经济增长分化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注:横坐标是按照对数形式绘制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集。

济均衡地增长,从而收入分配不能达到相对均等,就会造成社会分化,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如果社会政策不能适时、有效地应对这种局面,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时,传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就会起更大的作用,如发展战略、社会政策、收入分配及其导致的社会稳定程度。其中,导致分化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动荡,使经济增长停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察,无论使用哪种度量指标,中国城市和农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都反映出典型的不平等趋势。根据学者们的计算(Ravallion and Chen, 2004),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2002年进一步达到0.46。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分城乡的情况观察,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提高到1997年的0.34和2002年的0.38,而城市这几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6、0.29和0.34,提高幅度比农村大32个百分点。一旦把城乡居民合并起来观察不平等程度,总体基尼系数在每一时期都高于按照农村和城市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30,1988年就达到0.38,2002年高达0.45,说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可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是保证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形成了实践中的中国模式和理论上的“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2005)。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目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为世界发展实践和理论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本文从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讨论出发,结合中国和世

界的经济发展经验,总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影响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和转折点,并结合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发展,就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对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是要对发展的福利作用进行衡量和评价。虽然经济学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开始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是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或取舍关系,即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追求更多的公平一定要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Okun, 1975)。库兹涅茨揭示了一个似乎支持上述取舍关系的经验事实。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他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Kuznets, 1955)。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形曲线(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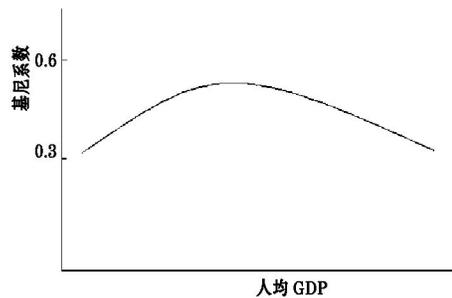


图2 增长与分配的倒U字形曲线

对于是否存在以及为什么会经济出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这种倒U字形曲线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是否真正存在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经济学中成为一个计量研究实验的热门话题和演练场所。经验证据既有支持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观点的,也有支持两者之间可以互相促进观点的(Blank, 2002)。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5a, Chapters 5 and 6)对各国发展过程中大量经验的总结表明,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公平影响经济发展,并表明公平对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在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其次,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会削弱制度的发展。我们知道,制度决定人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市场运行提供背景。因此,伤害制度发展

的现象必然不利于经济效率。此外,公平问题还通过一系列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关的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例如,这些因素表现在一些经济增长回归研究中,就构成一系列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Barno, 1998; Sala-i-Martin, 1996)。

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这个关系,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不可避免的所谓规律,被诸如瑞典、斯里兰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的概括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摒弃。虽然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学模式和政策理念,“先增长,后分配”逐渐让位于“边增长,边分配”,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中,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是发展中的难题。经济发展战略从而经济增长模式的正确选择,被认为是产生“边增长,边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选择了有利于发挥特定发展阶段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就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结果得以分享,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持续存在,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同,因而社会政策倾向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Lipton, 1977)。既然使每一个社会群体比较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要求一系列体制层面的改革。

当人们观察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字形变化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产生,即从收入差距扩大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这个转折,究竟是某种发展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还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进一步说,如果存在一种发展条件,它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出现,并且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这个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出现呢?如果归根到底差距的缩小是政府政策的结果,那么,政府从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到着力解决收入差距的转变动机是什么,转变的时机又在何时呢?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具有影响收入分配效果的功能,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有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并因此而诱导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是巨大的。然而,增长方式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需要市场机制的作用给予补充。此外,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对社会政策需求的反应程度,都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可能导致“库兹涅茨曲线”逆转的因素,并探讨如何有意识地促成这些因素朝着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方向发生变化。

三、市场机制的完善

市场机制并非天生造就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事实上,在从一个没有市场的体制起步,逐渐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个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式倒U字形曲线,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发育水平提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收入差距先上升后下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入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例如,发达地区通常资本相对丰裕,贫困地区劳动力比较丰裕,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的话,发达地区的资本向贫困地区流动,可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满足贫困地区资本积累不足的劣势,也降低了资本在贫困地区的回报率。反过来看,劳动力从相对贫困的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既提高劳动的边际回报率即贫困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又降低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还解决发达地区劳动力短缺和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从产品市场来看。实际上,产品的交换等于用含有生产要素的产品作为载体,代替生产要素进行流动。如果具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产品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没有制度性障碍,国内贸易就会诱导出各地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生产分工。那些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地区就会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资本相对丰裕的地区进行交换。不仅各地都获得交换利益,更主要的是这种交换实际上是产品所内含的生产要素的交换,从而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报酬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在地区之间的趋同现象,结果就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机制中改善收入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发挥作用。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但是,迄今为止市场机制仍然没有完善,地方性保护主义导致的产品市场封锁,阻碍地区之间的产品贸易,户籍制度和金融体制等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要素在地区和部门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World Bank, 2005b)。例如,研究表明,改革开放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工资差距中由地区差异贡献的比重也缩小了。但是,与此同时,工资差距中由部门差异贡献的部分增大。这就是说,在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条件相对改善的同时,劳动力进入某些垄

断部门的障碍反而加大了(Cai and Du, 2004)。这也是近年来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清除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建立和规范统一的国内市场,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

政府再分配职能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从而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被广泛运用的缩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并不是只要具备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动机,就可以完美地履行这个职能。事实上,大多数收入分配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情况,通常与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关。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政府征税能力明显不足,以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资源。同样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具备了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动机这样做,如何进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问题。在扶贫领域,如何把扶助真正瞄准应该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个长期讨论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阿玛蒂亚·森(2004,“译者序言”)分析饥荒时指出,饥荒可能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往往也并不是由于物质资源的绝对不足,而是一系列制度因素导致分配不平等,同样地,这些制度障碍也妨碍政府良好履行其再分配职能。无论是由于受到相对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左右,还是由于政府能力本身的孱弱,进行再分配的效果皆有待于改进。

针对中国目前进行再分配的需要来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对扶助对象的瞄准,改善再分配机制的效率。构造经济发展自身的收入分配机制,并不意味着不必采用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实际上,当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增长过程中大部分劳动群体的收入问题之后,社会再分配政策便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更加集中使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效果。为此,要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的扶助对象。在明确界定再分配政策扶助对象和范围之后,需要通过更加准确的瞄准,集中资源扶助真正的困难群体,提高政策效率。

集中再分配资源,需要关注下列困难群体的需求。第一是对于因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而陷入困难的群体如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进行救助。第二是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平衡共济,如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失业人员领取保险金等。第三是对由于政策因素承受特殊冲击群体进行补贴或救助,如对于资源枯竭型产业与企业脱离劳动关系的工人进行补偿。最后是对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造成

的困难对象进行特殊支持和扶持,如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工业反哺农业等地区或部门支持政策。政府应该在界定和瞄准困难人群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护网络,实现“应保尽保”。首先是创造条件,逐步把所有城市就业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制度中。其次是借助社区平台,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瞄准水平。第三是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并且把农民工以适宜的形式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此外,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建立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五、社会容忍程度变化

上述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都会根据社会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容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接近极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分配状况的职能,包括维护统一的国内产品市场,让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这里所说的社会容忍程度变化可以有两个来源,从而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绝对意义上,收入差距和贫困到达了它们的极限。例如,过大的差距和极度的贫困已经无法使陷入绝对贫困的人群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不再容忍往往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军事政变和揭竿而起等,往往是由收入的极端不公引起的。前面讨论的所谓“拉美陷阱”或“拉美现象”,以及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社会风险的增大,都与社会对收入分配状况不堪容忍,从而产生一系列恶性后果直接相关。

第二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相对的意义,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对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政策倾向相应改变。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改变,劳动者的分配地位就发生变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有利于增长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国内市场更加统一,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发展经济学家观察到,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

况,转变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刘易斯最先从理论上概括了这个重要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转折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Lewis, 1954)。实际上,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一个国家先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进入劳动力有限剩余的状况,即劳动力虽然尚未绝对短缺,但各种结构性的短缺开始反复出现,表现在地区性、部门性和技能上面的短缺现象。这种变化不仅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反映给企业,从而形成工资上升的趋势,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会组织行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对此进行积极的反应,抓住劳动力供求中的变化端倪,加快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就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重合起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贫困的消除。

经过 30 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 1.7。作为这个人口转变的结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逐年下降,预期在 2013 年左右不再增长,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蔡昉, 2007)。这种用工荒的一个积极效应,就是包括工会维权事业发展在内的劳动关系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工会抓住出现劳动力短缺这个机会,将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就业维权对接,解决了本地企业用工难题,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维护了外来工的权益,改善了他们的就业环境。作为一个象征,2005 年泉州市工会会员比 2000 年增加了 2.4 倍,增加的几乎全部是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外来工(邵芳卿, 2006)。

六、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差距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使劳动力流动发挥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要求出发,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取消人口流动的限制和户籍登记办法,更重要的是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均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推力与拉力。不同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镇和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和进展上有很大差异。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同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所差异,或通过市场获得公共资源的程度不同,造成推力和拉力的不均衡。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需要在相关领域进行配套改革。

库兹涅茨在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曾经假设城市比农村有更高程度的收

入不平等,因此,他预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扩大总体的收入差距(Kuznets, 1955)。然而,中国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全国的收入差距可以被分解为农村组内差距、城镇组内差距和城乡组间差距,或者说这三个部分差距构成了整体收入差距。2002 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 0.37,城镇的基尼系数为 0.33,而全国的基尼系数为 0.46。从中可以看到,第一,农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镇,但城镇收入差距的提高速度比农村要快;第二,在总体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于组内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5)。同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扩大,总体收入差距的这一成分的贡献份额也占主导地位(Kanbur and Zhang, 2004)(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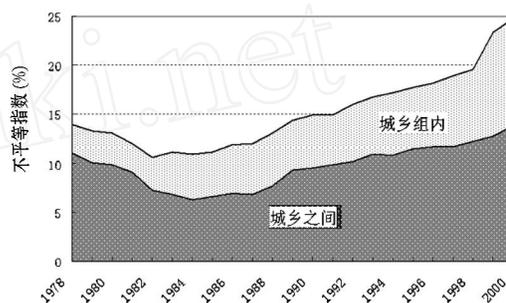


图 3 不平等指数及其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 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4/50.

从对收入差距的这种分解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启发是,既然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很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有助于降低整体收入差距。这个收入差距的降低是通过两种效应达到的。第一个效应产生于人口从差距大的地区到差距小的地区的转移。第二个效应直接来自于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转移。假设这个迁移没有产生足够大的差距扩大效应,从而不会抵消上述两种迁移效应,总体收入差距就应该缩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一定时间内处于边缘的状态,按照城市的标准他们有时会陷入贫困。但是,由于迁移的原因和动机是绝对贫困和相对剥夺(蔡昉、都阳, 2002),因此,在自主选择迁移的条件下,迁移者的总体状况是改进的。实际上,总体收入差距的缩小就是在差距过大的两极变成多级的变化中实现的。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实行不同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不同的就业结果和社会经济后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增长方式,

在劳动力尚丰富条件下形成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降低经济增长过程对就业的吸纳,阻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维持了落后的劳动力分布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如果发展战略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形成的,按照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得到大的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

为了给城市化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的要求构建城市治理机制。目前,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领域,甚至企业行为,都与户籍制度本身的排他性质相关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被全面地排斥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流之外。而一旦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机会上也受到歧视性待遇,这种身份的边缘化还会在代际之间保留,形成经济地位和人文发展的制度性隔绝。这种状况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是格格不入的,长期维持下去会构成社会不稳定,进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此外,资本的流动是劳动力流动的的必要补充。因此,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育资本市场,使资金能够向稀缺从而边际回报率高的地区和部门流动,同样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

注 释:

“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亚当·斯密,1996)。

Whalley和 Zhang(2004)在假设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迁移的唯一障碍的条件下,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

参考文献:

- [1]Barro, R. (1998)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 [2]Blank, Rebecca (2002) Can Equity and Efficiency Complement Each Oth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20
- Cai, Fang and Yang Du (2004)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Wage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in Ross Gamaut and Ligang Song (eds), China: Is Rapid Growth Sustainable? Canberra: Asian Pacific Press
- [3]Gill, Indemnit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4]Kanbur, Ravi and Xiaobo Zhang (2004)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 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4/50.

[5]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pp. 1 - 28.

[6]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pp. 139 - 191.

[7]Lipton, Michael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Okun, Arthur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9]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4)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Policy Research Paper 3408,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0]Sala-i-Martin, X. (1996)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 (July), pp. 1019 - 1036.

Whalley, John and Shuming Zhang (2004)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68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World Bank (2005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World Bank (2005b)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Report No. 31973 - CHA, June 13.

[13]阿马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蔡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及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

[15]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2,(4).

[16]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8]邵芳卿.泉州现象:缺工倒逼工会维权[N].第一财经日报,2006-2-16.

[19]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作者简介:蔡昉(1956-),男,江西萍乡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晨曦